

##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若干学派评析\*

裴小草

**内容提要:**自边际效用学派建立西方经济学新古典主流范式以来,总要遇到在这个主流范式限定的经济学范围内无法解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目前,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仍然只用市场交易定义资本主义经济,用主观价值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说回避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对流通过程和交换关系的决定作用,这也就阻碍了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凯恩斯学派在宏观经济层面打破了边际效用学派的一些假设,提出了一些有助于在短期内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对策。但当它提出的对策遭遇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等问题的长期困扰以后,它的理论像反凯恩斯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各种理论一样走进了死胡同,因为它也像它的那些论辩对手一样,回避了对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探讨。

**关键词:** 边际效用学派 凯恩斯学派 反凯恩斯学派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受到了严重挫折,经济危机一度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无关紧要的插曲,出现了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或者能够解决一切与经济危机相关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也常常被看作只是研究别的问题而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无关。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延续至今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以后,人们重新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存在及其对各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经济理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关性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这里的“相关”不仅是指其中有的理论研究了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和应对方法,而且是指其中有的理论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什么不会发生及其条件。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国富论》的二百多年以来,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在不断提炼概念,搜集事实,构建模型,标榜自己提出的理论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严谨和最科学的。然而经济学知识的积累从来没有笔直和平坦的道路,也不会因为从业人数多就一定取得的成就大。正像他们所研究的

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西方经济学中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也不断遭遇危机。经济学家很难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保持对研究对象的客观中立态度,西方经济学的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常常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站在少数资产者的立场上,以他们的利益为标准,对他们有利的话就说,对他们不利的话就不说。

每经过一段时间,西方经济学的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就会出现不同的学派,每个学派都会因在新的条件下为资产者的利益辩护乏力而遭遇挑战。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就西方经济学中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的基本理论来说,随三次比较大的变革出现过三个影响比较大的学派:即随19世纪70年代边际变革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随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Keynes)变革出现的凯恩斯学派,随20世纪70年代对凯恩斯变革的反变革出现的反凯恩斯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学派。这些学派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虽然经过各种包装很像纯粹的科学,但通过与现实、与其他学派的对比分析,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非纯粹性和局限性。

\* 裴小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pei-xg@163.com。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及其历史作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重点课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项目批准号:11JZD004)的研究成果。

## 一、边际效用学派及其理论缺陷

随边际变革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是经济理论站在少数资产者立场上的最好例证,它把经济研究的焦点转移到了一个与社会其他现象隔绝的狭小领域,从而在论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意义上,实际上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此以前,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财富如何创造和分配,这样他们就必须以当时的社会和历史为基础提出相应的命题和概念,表达对不同经济组织形式的观点,无法回避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这种研究的出发点是劳动价值论,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于是,在这种理论里,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财富的唯一客观和独立的测量尺度,它代表着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这个概念为经济学这个当时的新学科划出了边界,并且为研究不同形式经济社会的经济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种理论论证说,劳动而不是土地或黄金才是财富的直接源泉,所以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它以最快的速度增长上来。这种理论为批判当时的封建制度,特别是封建制度对劳动生产率、竞争和自由市场发展的阻碍,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工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用这个工具攻击有利于地主阶级利益的限制性政府政策和法律,支持新兴的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认为这个阶级靠对资本的所有权<sup>①</sup>取得了支配劳动过程的力量和机会,促进了财富增长。

19世纪40年代以后,《谷物法》被废除了,英国工业资本家的政治权力有了保证,劳动价值论对于他们来说,危险性开始大于有用性。他们现在需要一种能够适于维护而不是批判现存经济秩序的理论。这时,社会主义者和李嘉图主义者利用劳动价值论和他们争租金、争利润,批评他们剥削工人,支持工人诉求更公正的财富分配。这显然是对他们不利的。危险思想的压力总会激发出学术型特殊天才,于是,在西方经济学界,各种各样的学术批判瓢泼大雨般泼向劳动价值论,使潜伏其中的逻辑错误被不容置疑地揭发了出来,不久这个理论在主流西方经济学界像充满矛盾和混乱的垃圾一样被抛弃了。

这时候,西方经济学界又很幸运地出现了一个不再依赖劳动和劳动时间的价值理论,这就是边际效用论。这个理论以其巧妙地选择,成功地从经

济学中移走了一切对资产阶级不利的麻烦,也舍弃了经济学曾经具有的历史限制性方面,让经济学家从此在经济学的范围内,可以把现存经济秩序看作是以前从来如此、以后也不会改变的。边际效用论是一批经济学家在一个很长时期里逐步提出和完善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杰文斯(Jevons)、门格尔(Menger)和瓦尔拉斯(Walras),而真正使这个学说上升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则是马歇尔(Marshall);另外,“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和帕累托(Pareto)也是这个理论的重要提出者,只是他们给出的解释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表面上,这些经济学家提出边际效用论是为了克服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点,其实,更多的还是为了用这个理论反对社会主义、捍卫资本主义,特别对于庞巴维克(Böhm-Bawerk)、米塞斯(Mises)和哈耶克(Hayek)等人来说更是如此。

在边际效用论里,价值只是个人对商品的主观评价。对于同一个商品,每个个人都有程度不同的评价。市场是由独立行为、总想用花费最小的成本争取最大收益来追求最大“效用”的经济人组成的。买者和卖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都没有实质性区别。所有“经济人”都受到市场竞争看不见手的支配,其理性行为只意味着要取得最大收益。所有个人的主观偏好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消费需求,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可以带来最低成本下的商品供给以满足这种需求。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交点就是产品的价格,这个价格就是这个商品的价值。于是,对于边际效用学派来说,一个商品在市场上的卖价就是它的价值,价格等于价值,价值等于价格。经济研究的焦点改变了,不再有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条件,只有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什么创造价值的问题被新的价值定义排除了,诸如收入分配、经济增长、贸易循环、生产集中、资本出口以至经济危机等其他问题,也都被放到了很次要的位置,几乎不被关注了。既然现在价值就是价格,什么能产生价格什么就和劳动一样是“生产的”,比如土地和资本。

边际效用学派的极端观点走得更远,它们不仅只用市场交易定义生产的内涵,而且认为市场交易还能保证每个生产要素得到的收入价值等于它对生产的贡献,因此可以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在这里,市场交易是唯一的研究对象,经济学的唯一功能就是解释这种交易是怎样起作用的,正像罗宾斯的著名定义那样,经济学变成了“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

(Robbins, 1935, p. 16)。边际效用学派和古典学派一样只用市场交易来定义资本主义,但不同的是它把经济研究的范围限制得更窄了,只用市场交易来解释价格的形成和决定。

边际效用学派的这种做法刺激了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这个模型用大量高深的数学分析显示,在整个经济的某一点上,所有部门都可以实现平衡,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利用。这个点就是一般均衡点。这个点还能保证每个人达到最高水平的满足和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这里的“均衡”就是“最佳”,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不使另一人的境遇变得更坏的条件下使自己的境遇变得更好。通向这个人间天堂的道路是由完全竞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全无国家干预和每个经济人都最大化他的心愿垒成的。

边际效用学派也确实接受了一些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信条,特别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提出的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排除了资本主义市场恶性运作导致经济危机的任何可能性。它认为,不论生产了什么都能卖出去,因为支付给各生产要素的费用可以产生足够的收入去买所有被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个论点非常愉快地被边际效用学派的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模型吸收了。在这些模型里,只有价格运动对社会起作用,而价格运动是由市场上的商品供求决定的,价格就是价值,所以不必研究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在与边际效用学派同时代出现的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中,供求只能决定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整体价格波动应理解为围绕由生产过程产生的价值的波动,但这个理论完全被边际效用学派忽略或拒绝了。边际效用学派陶醉在帕累托最优的阳光下,只把市场交易看作唯一的现实,只研究市场交易中的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根本不考虑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和一小部分资产者控制经济过程的弊端。尽管这个学派不同流派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但在捍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基础方面却是高度一致的。

但是,边际效用学派还是为捍卫资本主义付出了无法解释现实的理论缺陷的代价。尽管边际效用学派经济学家很擅长给自己戴上眼罩,他们却无法永远逃避在他们所研究的经济中发生的事情。在一个存在卡特尔、托拉斯、工会组织和帝国主义对抗的世界里,完全竞争、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早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受过数次重创。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对经济学专业做了清算,这次严重

经济危机摧毁了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导致出现了大量长期的失业、经济停滞、贸易壁垒和不断增加的对竞争的限制。

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说来,这次大萧条像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庞大自然现象,正如斯特拉切(John Strachey)在他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著作中观察到的:“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居民,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所经历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实相当于原始人经历的大风暴和地震……在原始人中,有专家和术士或唱歌或嚎叫、或祭祀或诅咒去对付那些毁灭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有专家和经济学家,然而,他们却说经济危机是他们学科研究范围之外的事情”(J. Strachey, 1934, p. 15)。确实,边际效用学派对大萧条根本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按照他们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作的模型,经济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他们的理论模型里,资本主义经济中总有自动的力量把经济带回充分就业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

于是,就连边际效用学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希克斯(J. R. Hicks)等,这时都对市场自动恢复最优状态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力量失去了信心,但边际效用学派中仍有人认为,即便经济危机不是虚构的,它也是政治和外生因素干预市场运作造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巨大的经济灾难,竟被这些边际学派经济学家排除在试图解释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通过市场自动建立收入水平和资源利用的一般均衡和最优状态,这在20世纪30年代完全看不到可能。

不过,因为一般均衡和最优状态都只是讲的人们的主观感受,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经济失衡也没能难倒边际效用学派的很多经济学家。他们论证说,不同的个人从他们货币收入中得到的相对满足是不可比的,因为每个人对效用的评价都是独特的和不能与别人比较的,因此,也就无从知道一个百万富豪从他的万贯家财得到的满足是否比一个失业工人从他的救济金得到的满足大。确定这两个实际收入哪个大些,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伦理问题。由于没有客观的价值理论,没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边际效用论也就无法反映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经济过程的社会关系方面。建立在由与世隔绝的个人不可测知偏好构成的主观价值论基础上的经济学,从逻辑上说,必然要把现实经济中所有那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和特点排除出经济学的范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表现出来的长期经济混乱和停滞,无

法在边际效用学派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里得到解释,也与一般均衡的所有预期相反,这使得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都受到了怀疑,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经济学家不得不暂且把边际效用学派放到一边,寻找既符合资产者利益又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所作为的新理论。

## 二、凯恩斯学派及其作用和局限

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震撼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极其尖锐化的条件下,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最广泛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达到四五千万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出现了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高潮。

也就是说,凯恩斯正处在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遏制作用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促成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在这个运动逼迫下,资本主义国家才被迫采取了很多有助于缓解经济危机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具体措施,然后才有了凯恩斯学派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所以,把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缓和都说成是依据了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或都说成是采取了凯恩斯学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所主张的政策措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过,应该承认,凯恩斯和他以前的边际效用学派经济学家是有所不同的,即他通过对边际效用学派经济理论模型的修改,把一些“政治”和“制度”等被这派经济学家排除出经济学范围的因素结合进了自己的分析,恢复了经济学与政府政策的联系。凯恩斯为具有不完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国有部门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设计了一个可以分析经济危机现实状态和产生原因的新经济学理论。这个新理论中对后来经济学发展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对政府的作用给出了正面的新解释。凯恩斯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成长的国有部门的重要性和潜力做出了积极评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模型认为,政府在市场经

济中只能充当守夜人,即保护合同、平衡预算和保持货币稳定。凯恩斯背弃了这个模型中的观点,他认为,在新的国有部门和新的私人机构规模庞大,特别是生产集中和工会组织不断成长的情况下,政府被动无为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国有部门的庞大规模赋予了政府创造经济繁荣的权力,它可以运用支出和税收政策调控经济中其他部门的收入和支出。因此,凯恩斯的大部分理论都被认为是试图解释政府作为经济代理人存在的合理性的,它们认可政府的新作用,论证政府应该对经济的总体状况负有责任。凯恩斯的思想影响是不难看到的。接受凯恩斯理论、急于推翻边际效用学派正统地位的一代年轻经济学家发动了经济思想变革,形成了热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

凯恩斯变革前后,政府干预不仅受到职业经济学家的尊重,而且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因为政府干预在当时已经成为实践的迫切需要。先是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和“新政”美国,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都有很多政府干预的实践。就英国来说,它当时所实行的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预算政策,被认为是可行的和成功的。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使得冲突过后所有政党都一致同意扩大国有部门,扩大社会服务支出,对基础产业实行国有化和政府对充分就业负责。凯恩斯学派提供了一种现实世界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可以为经济管理提供一套有用的信念和准则。二战以后,接受凯恩斯观点的“新”经济学的所有分支都开始关心实践问题——如何促进更高的增长,如何管理需求,如何提高生产率,如何稳定物价等等。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在19世纪中叶以后逐步进入了无产阶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资本主义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冲击。正是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政治势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体系和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和较量过程中,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被迫做出体制机制调整,经济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到处都有掩饰不住的危机和衰败征兆——财富不平等、法西斯横行、社会冲突尖锐、工人在失业中忍受饥饿、机器在闲置中找不到用途。但1945年以后,一些资本主

义国家为延缓其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命运,不得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改良,包括实施了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新的繁荣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业比较充分,经济周期波动比较温和,劳动生产率有了比以往更快的增长。很多人把这种主要产生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强势崛起的结果,都归功于实施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对凯恩斯学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高评价。

一些人认为,凯恩斯学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的所有“经济问题”,在他们看来,如果在政府干预下,经济周期波动可以比较温和,充分就业可以确保,市场可以在国内外不断扩张,只要新技术能不断被采用到生产过程中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再没有什么因素可以阻碍经济增长。但是,一个凯恩斯学派始料未及的新经济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这就是永久性的通货膨胀。温和的周期性通货膨胀成为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规状态。开始时,价格上涨只被看作是对经济的小干扰,是个经常要去对付的“最微不足道的经济问题之一”。每年2%到3%的温和通货膨胀被认为是与充分就业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合理交换。很多经济学家甚至还认为,需求管理技术的完善只是个时间问题,等这种技术完善了,政府就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保持物价和增长的稳定。

然而,随着管理技术的完善和管理经验的增多,通货膨胀也越发严重了。在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使用建立在凯恩斯学派经济理论基础上的政策来遏制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凯恩斯学派遭到广泛的怀疑。到20世纪60年代末,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接近两位数,出现了重大的货币危机。这些使很多人对凯恩斯学派的信心丧失殆尽,西方经济学界再次钝刀闪烁,出现了凯恩斯变革的反变革,西方经济学涌现出了很多新老学派——以货币学派为代表的反凯恩斯学派以及再次复兴的其他学派。

通货膨胀使西方经济学界内部出现巨大分歧,凯恩斯范式不再受到普遍赞成,各种理论和政策争论都由此展开。像早期最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样,凯恩斯学派的声誉是建立在能够解释和应对经济问题的基础之上的,当它表现出对新出现的实际经济问题无能为力时,它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结果,凯恩斯学派独占西方经济学界主流地位的时间,

比边际效用学派独占的时间还要短很多。现在,新凯恩斯学派、通俗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左派凯恩斯学派、剑桥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综合凯恩斯学派等等,再加上一个更加庞大繁杂不断增多的各种反凯恩斯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货币学派、新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和黄金拜物教学派等等,相互之间都是有联合也有争论。

在凯恩斯学派取得主流地位以后,西方经济学被分成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支学科。宏观经济学研究产出、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决定等问题,是由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宏观学派及它们的各种混合共同支配的。微观经济学包括企业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以及对价格决定等的研究,仍主要由一般称为新古典学派的边际效用学派理论主导。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这种框架下,凯恩斯学派从没有改变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根基。它只是打击了边际效用学派的就业理论,并用自己的理论替代了它。等时机一到,边际效用学派的各种理论就重新成长起来,爆发出足以压倒凯恩斯学派能量。

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通过比较可以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变革其实对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并没有什么重大突破,而只是以把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作为一种应用技术被接受为标志,开始了西方经济学内部的长期混乱和重组。在1945年以后的最初10年,凯恩斯学派似乎占有优势,没遇到太多挑战,但在基本理论层面它并没有击垮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让人们只相信自己的理论。边际效用学派的经济学家只是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他们始终坚持其经济理论模型的有效性,认为凯恩斯的整个理论只是一般均衡理论应用方面的一个特例,根本就不是一个有关就业的一般理论。

凯恩斯学派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并没有取代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而只是在这个理论中增加了一些反映“制度因素”的假定,特别是工资率的通常“拒下刚性”假定。由于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深入分析,凯恩斯学派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通过对边际效用学派理论的一些修补,在流通领域研究如何通过政府干预增加有效需求,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提出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依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理论所采取的经济危机应对措施,

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又因没有解决生产分配领域的基本矛盾有阻碍经济发展的效应,为以后的更大危机埋下了种子。

### 三、反凯恩斯学派及其 与凯恩斯学派的争论

正如前面提到的,反凯恩斯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继续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争论时,起初只是说,凯恩斯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并没有取代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模型,只不过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假设,特别是工资的“拒下刚性”假设。经济学家不应为现实世界的缺点负责,他们的理论没有错,不必改变,是现实有错误。这种说法虽然否定了凯恩斯变革的理论意义,但还没有构成对凯恩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全面攻击,对凯恩斯学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全面攻击,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反凯恩斯学派中一批自称“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发起的。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一些经济学杂志不断有文章称货币学派对凯恩斯变革实行了反变革(H. G. Johnson, 1971; M. Friedman, 1970)。这个特殊反变革交响曲的指挥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他在那里为这个反变革所做的准备事实上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和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局限则给了这些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出头的机会。

货币学派等反凯恩斯学派和凯恩斯之前的边际效用学派一样,对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经济危机问题是极力回避和否定的,只是在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什么不会发生及其条件的意义上,实际上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特色。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不会产生经济危机,凯恩斯学派主张用政府干预的办法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没有必要和有害的,只有政府干预引起的通货膨胀才是经济学需要研究克服的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最著名的观点是,通货膨胀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既然通货膨胀一般被定义为物价上涨,价格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么在不使用某种货币形式作为交换工具的经济中是几乎不可能存在通货膨胀的。这本来是个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但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对这个常识做了自己的极端解释,这种极端解释所包含的研究和控制通货膨胀的特殊含

义,是比较新奇的。

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认为,货币现象并不只是反映实际现象,它本身具有独立的形式和自己的影响。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实际上只把经济现象作为使用价值来研究的,消费和投资都与个人的实际支出计划相联系,这些计划是反映个人物质目标愿望和能够满足个人物质需求的,但他们忽略了市场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即所有产品都是以商品形式,也就是以货币形式出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可以极不相同。在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那里,生产和分配都是在实际力量影响下运作的,货币只是面纱。他们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把注意力全集中在研究消费者、资本家和政府的实际支出计划上,认为这些计划决定了实际的有效需求水平,从而也决定了国民收入和就业。货币无关紧要,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记账单位。

上面这些都是货币学派概括出的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凯恩斯学派当然并没有那样说过,但听起来凯恩斯学派确实似乎可能有那样的意思。于是,货币学派接下来断言,如果把货币重新界定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原动力,那么凯恩斯学派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切分析和药方就都是无效的。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控制经济,而不必直接干预。一些过激的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还轻描淡写地改写经济发展史,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所有经济波动,即所有萧条和繁荣、危机和复苏,都主要是由于货币供给的变化造成的,所以都是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责任。只要政府学会适当地管理货币供给,停止干预自由企业市场经济的精巧运作,经济周期就会消失,没有通货膨胀的稳定增长也就可以实现了。

这种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曾经很受凯恩斯及其追随者鄙视的货币数量论。这种理论简单化地宣称,价格水平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用公式表示就是  $MV = PT$ ,即价格(P)乘以交易数量(T),必须等于流通中货币数量(M)乘以流通周转率,也就是货币转手的速度(V)。这个公式本身似乎是无害的,因为根据定义这是对的。但货币学派总把它解释为,货币是经济的原动力,价格的任何变化都依赖于货币(M)的事先变化(假定 V 是常量不变)。这样,货币学派就在复活货币数量论时给它加上了反凯恩斯变革的新意。

凯恩斯学派认为,货币流通周转率不是一个常量,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的高低都要适应经济中的

各种实际力量的表现,要适应政府、资本家和消费者计划的相互作用。价格水平是由这些实际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货币供给决定的。货币学派则认为,要理解价格怎样决定,必须先研究货币供给的变化,它是独立于经济中别的变化。通货膨胀率并不直接和货币供给增长率成比例地变化,至少两者不是立刻成比例地变化。在短期内,货币供给的变化主要会影响产出水平。依据这种观点,货币学派进而认为,正是愚蠢的美国联邦当局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开始时猛然把货币供给减少三分之一,才导致了产出的急剧下滑,引发了那次有史以来最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Friedman & Schwartz, 1963; A. Walter, 1969)。但从长期看,货币供给的变化确实会影响价格。货币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只能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快于产量增加的结果。如果货币流量和商品服务流量不匹配,其差距只能由价格或者上升或者下降来填平。

针对反凯恩斯学派的上述观点,凯恩斯学派争辩说,物价因货币供给增加而上涨的情况,只有在货币转手的速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货币转手速度提高,价格就可以在货币供给量没有任何变化下上涨。而且,凯恩斯学派确实认为货币转手速度是高度可变的。于是,货币学派经济学家投入大量精力论证说,货币转手速度在通常情况下是高度稳定的。他们指出,货币需求是由每个个人的收入水平决定的,每个人都会在他们的收入中选择握有一定比例的现金,这个比例是独立于现行利率、不受现行利率变化影响的。这个比例也就为货币供给的周转速度的可能变化设置了明确的限制。只有在货币作为价值标准完全崩溃的地方,在加速通货膨胀的场合,当价格水平每月可能增加两倍时,货币转手速度才会很快提高,但在这些场合,货币供给也在同期增加很快,整个货币系统不久一定要坍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货币转手速度快速增加的唯一例子,发生在 1952 年朝鲜战争时期通货膨胀中的美国。那时通货膨胀的急速上升,因货币供给量并没有追加,结果只持续了六个月就渐趋消失了,可见货币转手速度的提升确实存在明确的限制。

不过,凯恩斯学派还是认为,货币学派经济学家看事物的顺序不对,总是从后往前看,他们先提出核算恒等式,再提出简单的治疗,最后则无视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性质。凯恩斯学派用了一个比喻,说弗里德曼像他之前的休谟(David Hume)一样,把货币数量的有效增加看作是从直升飞机洒下的大堆崭新

银行券。<sup>②</sup>在那种场合,如果产出不变,那些多余的货币花出去当然会在经济中引起价格上涨。但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货币供给却不是那样增加的。在现实中,只有当消费者和资本家提高了他们的支出,从而提高了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才会增加。

最初这种货币需求是通过现存现金余额、信贷扩张、银行存款减少以及这类其他途径的融资来满足的,这些融资增多会减少经济系统中的流动性,提高利率或形成利率提高的压力。利率的提高意味着政府债券价格的下跌,这会弱化政府向未来借债的能力,因为这样的话,政府的现期国债的偿还负担和短期出借负担都增加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央银行才会增加货币供给。所以,货币供给增加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政府愿意为满足各种需求增加货币供给则是因为要维持公共部门和政府支出的巨大规模和执行充分就业政策。要推行货币学派的货币限制政策,就必须或者抑制整个社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或者缩小公共部门和政府支出,减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或者上述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所以,货币学派提出的控制货币供给办法,并不像它描述的那样是独立于经济中其他变化和不受其他变化制约的。

从深层次上说,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等反凯恩斯学派的分歧,其实是根源于它们对二战以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国有部门的作用和性质有不同的评价,对如何对待已经出现的所谓“混合经济”现象也有不同的看法。货币学派等反凯恩斯学派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界在大萧条以后曾一度达成的理论共识,即政府的基本责任是维护充分就业。所有赞成货币学派主张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认为,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需要,可以允许失业增加。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要求的是,让货币恢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适当功能,即以普遍的标准方便交换,并且保持价值不变。因此,他们主张免去政府任意变化货币供给的权力。如果货币供给变化像季节那样可以预期,它就可以停止向经济事务中注入不确定性。理性的经济人就可以用他们的行为调节货币,而不是总期待让货币调节他们。

在这一点上,可以鲜明地看到货币学派怎样融入了凯恩斯以前的边际效用学派以及其他反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如果政府失去变化货币供给的权力,它也就失去在经济萧条时用赤字财政刺激经济的权力。它必须平衡收支,只支出它通过税收和借款得

到的费用,而不再能通过印出更多货币去资助新的支出。于是,政府也就不再能对维护充分就业负责。这样,也就又回到了凯恩斯学派出现以前的边际效用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工会的责任。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20世纪20和30年代在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之所以出现了长期的大量失业,都是因为工会拒绝接受对工资率的足够大的削减,工会是失业存在的原因。

各种反凯恩斯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学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共同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竞争性市场经济总是可以使资源配置走向某种充分就业均衡,所有经济周期、经济波动、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资源的错误配置,都是由某种对自由竞争的干扰造成的。这一点由反凯恩斯学派中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F. A. Hayek, 1974)表达得很清楚,他批判凯恩斯和凯恩斯学派说,失业的真正原因不是缺少需求,而是劳动的配置不能适应需求的配置,这使得生产无利可图。他一贯倡导的解决问题方法,是用失业和削减工资逼迫劳动在产业之间进行流动以便扩大利润。哈耶克认为,用增加货币供给来克服失业,只能暂时起作用,制造一种虚假繁荣,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阻止市场竞争发挥作用,不久,就又需要用“通货膨胀”来维持就业。由于要不断重复制造更大的货币扩张,给予工会提高工资率的权力和机会,充分就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

既然通货膨胀不可能以一种不断提高的速率永远继续下去,或迟或早资本主义国家就将面临一次新的产出和就业崩塌的经济危机。因此,基本的需要是再次让工会对失业负责,恢复货币的稳定性,“长期问题仍然是恢复能够产生与稳定货币兼容的工资率的劳动市场”(F. A. Hayek, 1968, p. 298),重新创造“未被改变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让劳动的重新配置与需求的配置相符,充分就业就能再次与实际的而不是“虚假的”增长兼容了。如果失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无法消除,原因一定是集体谈判中有垄断力量。哈耶克说,“需要的是,把形成与高水平稳定就业相容的工资率的责任,公正地放到该放的地方:放到工会身上”(F. A. Hayek, 1974, p. 298)。

哈耶克的这个观点,是所有反凯恩斯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学派都会同意的,只是他们在如何重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的经济上主张的方法不同。在这个问题上,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老人们比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实际很多。货币学派

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重建那样的经济只是个需要改变政府政策的问题,只要控制住货币的稳定增长,回到金本位制,别管失业扩大就行了。他们顾忌较多,一般不提工会,也没有责备工会制造了通货膨胀。但像哈耶克、哈伯勒(Haberler)和罗宾斯等反凯恩斯学派中更勇猛的斗士清楚地知道,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和政策都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强势崛起和工人阶级力量壮大的压力下不得已才制定出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本来并不愿意接受这些理论和政策,但为了延缓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命运才不得不作为权宜之计暂时采用它们。所以,他们明确指出,要改变政府政策首先必须弱化工会的政治力量,工会对经济毫无用处,如果可能应该取消工会(F. A. Hayek, 1974, p. 294)。

但是,反凯恩斯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始终面临着可行性方面的难题。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曾倡导立即削减工资以增加利润,说这是刺激经济恢复的唯一方法。但正如当时很多人指出的,即便这种办法真能奏效,也不具备可行性。政治民主和奥地利学派消灭商业周期的医治方法不兼容,不但是对萧条和危机开出的药方不对,而且会激化经常存在、时常爆发的大规模失业下的劳动者争取更高国民收入份额的战斗。他们估计,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实施奥地利学派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应对方法,一定会刺激工会的壮大和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仇恨,很可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K. Kurihara, 1955, p. 48)。

可能正是因为反凯恩斯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学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这种可行性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个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已经压倒凯恩斯学派占了上风,只是在苏东剧变前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陷入低潮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它的政策主张较多。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和延续至今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以后,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而采取了较多凯恩斯学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应对方法,采用反凯恩斯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学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应对方法较少,即便采用也显得比较谨慎。

#### 四、简短结论

本文讨论了1870年以来西方经济学界相继出

现的三个比较大的经济学派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尽管这三个学派经济学家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讨论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原因时,却大都承认那时发生的大规模失业不只是经济原因引起的。自边际效用学派建立了西方经济学新古典主流范式以来,每当经济学家试图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最紧迫的经济危机相关问题时,正如他们对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讨论一样,总要超出这个主流范式限定的经济学范围。

这一点就反凯恩斯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来说尤其适用。他们仍然只用市场交易定义资本主义经济,用主观价值论和理性经济人假定回避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对流通过程和交换关系的决定作用,这也就阻碍了他们对经济危机相关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解。凯恩斯学派在宏观经济层面打破了边际效用学派的一些假设,提出了一些有助于在短期内缓解经济危机的对策。但当他们提出的对策遭遇通货膨胀等问题的长期困扰以后,他们的理论像反凯恩斯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各种理论一样走进了死胡同,因为他们像其论辩对手一样,只用市场交易来定义资本主义经济,回避对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探讨。

我们看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各关键经济部门的庞大资本密集设施都是工人阶级直接操纵的,维持整个经济运转的能量也是由工人阶级直接控制的,这些都需要社会具有更高层次的利益一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中的基本矛盾,并不是反凯恩斯学派或称新自由主义学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用主观价值论设定经济学范围就能抹去的。同时,政府简单地通过扩大自己的权力控制经济来应对经济危机的作用是有限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单方主导政府权力形成的各种恶果,也并不是推行凯恩斯学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政策主张就能根治的。在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解决途径的情况下,西方经济学各个学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提出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

## 注:

- ①在古典理论里,这种所有权代表着过去积累的劳动。
- ②休谟曾设想,如果每个人醒来发现自己口袋里有一个金镑硬币,或一夜之间经济中的现金增加了五倍会发生什么。

## 参考文献:

- 陈佳贵 刘树成主编,2010:《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程恩富,2011:《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红旗文稿》第 18 期。
- 何孟孟主编,2004:《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凯恩斯,196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珊译,商务印书馆。
- 李慎明主编,2009:《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裴小革,2013:《经济危机整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伟光,2011:《世界金融危机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中国领导科学》,12 月 14 日。
- 吴易风主编,200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Friedman, M. & A. Schwartz(1963),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M. (1970), "The counter revolution in monetary", I. E. A. Occasional Paper, No. 33.
- Hayek, F. A. (1974), *A Tiger by the Tail*,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Hayek, F. A. (1968),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Johnson, H. G. (1971),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monetarist counter—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2):1—14.
- Kurihara, K. (ed.) (1955),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London: Allen & Unwin.
- Robbins, L. (1935),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 Strachey, J. (1934), *The Nature of Capitalist Crisis*, London: Golancz.
- Walters, A. (1969), *Money in Boom and Slump*,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责任编辑:李仁贵)